

# 七十年代中國出土的秦漢簡冊和帛書

朱德熙 裘錫圭

中國有悠久的文明史，是世界上保存古文獻最多的國家。不但有大量古文獻一代代流傳下來，而且還有大量古文獻埋藏在古代的遺址和墓葬裏等待人們去發現。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在中國發現了第三批重要的古文獻。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以來，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發現了大量商代後期（公元前十四至十一世紀）的王室占卜檔案——甲骨文。二十世紀初年以來，在西北的內蒙、甘肅、新疆等地發現了大量漢簡和一些魏晉簡。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在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也稱千佛洞）的一個封閉了八百多年的窟室裏，發現了大量六朝至北宋（主要是唐代）的寫本和一些唐宋印刷品。在剛過去的七十年代裏，中國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和安徽省阜陽縣雙古堆等地的秦和西漢前期（公元前三至二世紀）墓葬裏發現了大量簡冊和帛書。這可以稱為近代以來新發現的第四批重要古文獻。

## 簡冊和帛書的形制

中國是植物纖維紙的發祥地。但是可以用於書寫的紙是在二世紀初才出現的，紙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書寫材料，大約是從四世紀開始的。戰國時代的《墨子》裏屢次說“書於竹帛”（《天志》篇中）、“書之竹帛”（《明鬼》篇下、《天志》篇下），在用紙之前，竹和帛是主要的書寫材料。

竹子用於書寫之前，先劈成細長條的薄片，並加刮削，使之便於書寫。這樣的竹片叫做“簡”。不產竹子的地方，通常以木為簡。西北地區發現的漢簡絕大部分是木簡，河南、山東、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發現的戰國秦漢時代的簡，幾乎都是竹簡。簡的寬度一般在0.5至1厘米左右，簡上通常只寫一行字。簡的長度往往視用途而異。例如在漢代，官府用的正式法律文本用三尺或二尺四寸長的簡（當時的一尺長23厘米左右，相當於現行中國尺的十分之七左右）。重要的儒家經典用二尺四寸的簡。最常用的簡，長度為一尺，其次為一尺二寸。也有些簡長一尺一寸或短於一尺。由於簡的長短和字的大小不一致，一簡所容的字數沒有固定的標準。在一般情況下，一尺左右的簡大概寫三十字上下。

簡用絲繩或麻繩編聯起來就成爲“冊”。甲骨文冊字作等形，豎畫代表簡，或代表纏在簡上的編繩。從出土實物看，一般簡冊多用三道或兩道編繩。三道是上下端和中間各一道。用兩道的，將簡大致分成三等分。長的簡往往用四道甚至五道編繩。每冊包含的簡數可多可少。在一般情況下，先將簡編連成冊，然後再書寫。簡冊收藏的時候，卷成一卷，講究的還在外面加書囊。

如果需要書寫的文字不多，通常不用簡冊，而用比較寬的長方形木板，稱爲“方”或“牘”。一塊牘可以寫幾行字，反面往往也寫字（簡冊也有在反面寫字的，但不及牘普遍）。書信一般寫在一尺長的牘上，所以書信也叫尺牘。

因爲一根簡通常只寫一行字，所以這樣寫成的書是非常笨重的。漢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他的巨著《史記》的“自序”裏說，《史記》“凡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假定每根簡寫四十字，就要一萬三千多根簡。估計這部書當時的體積至少相當現代印刷的《史記》的五十倍左右，重量也一定大得驚人。史書記載秦始皇每天處理的文書，多得要用“石”爲計算重量的單位（一石重一百二十斤，相當三十公斤左右）。這些文書都是用竹木簡牘寫的，所以才會這樣重。

西北地區出的木簡多數是在漢代邊區的官署和烽燧遺址裏發現的。木簡埋藏在乾燥的沙漠裏，保存得很好，有些簡出土時簡直跟新的一樣。偶而還能發現編繩完好的整冊木簡。河南、山東、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出的竹簡，則都是在墓葬裏發現的。出簡的古墓大都密封得很好，墓裏多半有水。竹簡在水裏泡了兩千多年，字迹仍然非常清楚，可見中國墨的質量是很好的。不過麻煩的是竹簡出土以後，還得繼續浸在水裏。一離開水，很快就會皺縮、扭曲、變黑。近年來，有些博物館採用脫水的辦法保存竹簡，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現在我們知道，戰國時代以至秦代和漢代前期的墓葬裏，如果墓主人比較濶氣，多半都有竹簡。因爲那時候有一種風俗，死者下葬時，要把隨葬的東西開一張清單留在墓裏，稱爲“遣冊”。當時人講究厚葬，凡是活人要用的東西，死入也都得有一份。因此隨葬的東西從食物、器皿、衣着、車馬以至樂器、兵器，無所不有。因爲隨葬的東西多，清單也就相當長。此外，還有把死者在世時所讀的竹書埋在墓裏的。這樣說來，在戰國和秦漢的墓葬裏，竹簡應該是很普通的東西了。可是我們却一直到了五十年代才在墓葬裏發現竹簡。這其實也不奇怪。因爲在舊中國，挖掘古墓的多半是圖利的盜掘者。盜掘者的興趣在金玉銅器。他們不注意也不認識竹簡，即使偶爾有人撿回一些，離開水不久就毀壞了，根本保存不下來。

帛比竹木輕便得多，但是也貴重得多，作爲書寫材料大大不如竹木用得廣泛，而且帛又比較容易損壞，所以古代的帛書一直很少發現。七十年代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一批帛書，幾乎是我們了解古代帛書形制的唯一依據。

馬王堆帛書的高度分48厘米左右和24厘米左右兩種。漢代的帛幅廣二尺二寸。48厘米約合漢尺二尺一寸，可知前一種是整幅的帛，後一種是半幅的帛。折算出來的寬度所以略小於漢代標準幅廣，可能是帛書曾經受潮畧有收縮的緣故。帛書的長度沒有一定。

有的相當長，例如抄有醫方和其他醫書的一卷帛書，估計全長在430厘米左右。帛書收藏的時候，或者一層一層地折疊起來，或者纏繞在二、三厘米寬的竹木條上，卷成一卷（後一種方法只用於半幅高的帛書）。帛書抄寫前，往往先用朱砂劃出豎格，每行寬約六、七毫米。整幅的帛還要用墨劃上下欄線，上下各留出一厘米多的天地頭（upper and foot margins）。半幅的帛書一般每行寫三十多字，整幅的一般寫六七十字。

帛書的行寬與竹簡的寬度相近，半幅帛書的高度與一尺二寸簡相同，整幅帛書的高度與二尺四寸簡相同，每行字數也很接近。整幅帛書的上下欄很像簡冊上下端的編繩。古代書籍多數是簡冊本，帛書本往往是從簡冊本過錄的，在行款方面出現帛書摹仿簡冊的現象是很自然的。

### 幾次重要的發現

七十年代之前發現的漢簡，時代沒有早過漢武帝後期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發現了幾批戰國時代的楚簡，但是秦代和西漢前期的竹簡一直沒有出土過。至於帛書，七十年代之前，只在敦煌和居延的漢代遺址裏發現過幾片西漢後期的書信題識之類的零星東西。長沙戰國楚墓裏發現過一幅帶彩色圖畫的帛書。七十年代發現的秦代和西漢前期（指漢初至武帝前期）的簡冊和帛書，填補了中國古文獻的一段空白，具有重大的意義。

七十年代最早發現的藏有簡冊的西漢前期墓葬，是1972年1月至4月間發掘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這座墓是西漢初期長沙國丞相軫侯利倉的妻子的墓葬。從地層關係看，稍晚於後來發掘的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馬王堆三號漢墓。由此推測，一號墓的下葬年代大約在文帝晚年。墓中出了三百十二根竹簡，這是一分記載隨葬物品的清單——遺冊，不是真正的“書”。

緊接着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1972年4月在臨沂銀雀山發掘了相鄰的兩座漢墓。兩座墓的埋葬年代顯然很接近。一號墓裏發現了大量竹簡。二號墓裏發現了由三十二根簡組成的一份日曆譜，據研究是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根據兩墓的形制、遺物，特別是上述元光元年曆譜，可以斷定它們是武帝初期的墓葬。

一號墓是在建築工程中偶然發現的，竹簡殘損得比較厲害。出土的全部竹簡編號在六千以上，但大部分是很碎的殘片，比較完整的簡只有幾百根。這批竹簡現在已經初步整理完畢。整理者雖然在綴合殘片和繫連簡文方面化了很大力量，還是遠遠不能恢復這批簡冊的原貌。這批簡冊基本上都是古書鈔本（不過有些書在當時也許還稱不上“古”），可以分為三類來說：第一類是現在還有傳本的，例如《吳孫子兵法》（通常稱《孫子》）、《晏子》等。第二類是雖無傳本但漢代人編的書目（《漢書·藝文志》）裏曾經著錄過的，例如《齊孫子》（近來多稱《孫臏兵法》）、《地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兵家）。第三類是我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著作，內容有兵法，政論，講陰陽、時令、占候的書，以及講相狗（judge a dog's worth by its appearance）、作醬方法的雜書。這一類書裏，有的有書名或篇名，有的因為竹簡殘損，連名稱也不知道。這批資料已經發表過一部分（書目見附錄），全部圖版和釋文、注釋準備分三輯陸續出版。

1973年11月至1974年初，發掘了馬王堆三號漢墓。這大概是軀侯利蒼的兒子的墓葬。墓中所出的文字資料表明此墓下葬於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這座墓裏發現了大批珍貴的帛書，主要有《周易》和解釋《易》的經說、兩種本子的《老子》（整理者稱為甲本、乙本）、附於這兩本《老子》的幾種佚書、摘記並評論春秋時代史事的書、類似《戰國策》的書、講相馬的書，以及很多種醫書和講陰陽、占候的書。有些帛書的字體較古，大概是秦代鈔本。此外墓中還出了一些畫在帛上的圖，其中有水平很高的地圖。這些帛書、帛圖由於長期折疊已沿折痕裂開，各層之間又因受潮互相黏連。出土後，由技術專家細心揭開，又經過整理者認真拼合，現在除去幾種過於殘破的以外，都已大體復原。這批資料已經發表過好幾種（書目見附錄），全部圖版和釋文、注釋準備分六輯陸續出版。除帛書之外，馬王堆三號漢墓還出了不少竹木簡。一部分是遺冊，一部分是講養生之道和房中術的書。

1975年底至1976年初，在雲夢睡虎地發掘了戰國末年至秦代（公元前三世紀中後期）的十二座秦墓。1975年12月發掘的十一號墓，棺內藏有一千一百多根竹簡，大體完好。這是秦簡的第一次發現。這批竹簡裏有秦律的鈔本、對秦律的問答體詮釋、關於治獄的各種文書程式的匯編、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間國家與墓主家庭的大事年表，以及格言和字書的鈔本等。此外還有兩種講時日禁忌等迷信的《日書》。根據上述大事年表可以斷定這座墓是秦始皇三十年或稍晚一些下葬的。墓中所出法律文書大概是曾任獄吏的墓主私人參考用的，所以沒有用三尺或二尺四寸長的簡。這座墓出土的簡冊，除去兩種《日書》，都已發表（書目見附錄）。目前正在準備出版包括《日書》在內的全部簡冊的圖版和釋文、注釋。

1977年在阜陽雙古堆發掘了夫妻並葬的兩座西漢前期墓。根據墓中所出器物的銘文，可以斷定一號墓的墓主是死於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的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這座墓出了一批竹簡，可惜由於在墓中長年受到擠壓，不但殘碎得很厲害，而且已經黏結成一個大塊。這批竹簡目前正在由技術專家細心剝離。據初步觀察，知道包含《詩經》、《蒼頡篇》等書。

在七十年代裏，除了以上幾批重要資料以外，還在廣西省貴縣、湖北省江陵縣等地的好幾個西漢前期墓葬裏發現過簡牘。江陵鳳凰山十號墓出土了一批記賦稅、徭役等事項的鄉文書，其餘各墓所出的基本上都是隨葬物的記錄。

## 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的難易繁簡取決於竹簡和帛書的保存情況。在幾批重要資料裏，雲夢秦簡保存得比較好，大部分竹簡都是完整的，所以整理得比較快。銀雀山竹簡殘損情況嚴重，整理工作花費的時間就比較長。就竹簡而言，整理工作除了清洗、裝管、編號、照相等純技術性工作以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拼接，即把折斷的碎簡拼接起來。拼接的根據是：①文義是否相連。有時一個

字裂成兩部分，還可以根據字形拼復。②斷簡碴口的形狀。③斷簡的部位，即看它是簡頭還是簡尾，有時還可以根據編繩的痕迹確定它的部位。④字體和行款。銀雀山竹簡共有六千多個編號，整簡還不到二十分之一，數學上可能的組合數大得驚人。因此肯定有許多本來可以拼接的斷簡目前還沒有拼合。

二、繫連，即確定同一篇著作裏竹簡的順序。因為每一根簡一般只寫一行字，所以實際上就是確定行的順序。

三、分篇分書，即確定哪些簡屬於同一篇著作，哪些篇屬於同一部書。

就銀雀山竹簡的整理工作而言，以上三項工作都是相當困難的。設想我們把一本現代的書按行剪開（這已經把問題簡化了，因為銀雀山竹簡包含許多種書），再把大多數行剪成數目不等的小段，打亂以後去做復原的工作。這個比方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銀雀山竹簡整理工作的複雜程度。當然，以上是針對現在沒有傳本的佚書說的，有傳本的書可以據今本對勘，工作比較容易一些。

四、考釋文字(deciphering)。先秦文字屬於古文字的範疇，秦漢時代通行的隸書屬於近代文字的範疇。因此雖然秦漢跟戰國緊接，可是文字的差別極大。戰國竹簡的文字非常難認，而秦漢竹簡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字都是可識的。當然也有一些字不易辨認。例如銀雀山竹簡有一個“習”字。經研究知道這是“翼”字的另一種寫法。“翼”和“已”古音相近，因此以“異”作為聲旁(phonetic part)的字也可以換用“已”作為聲旁，“祀”可以寫作“禩”，就是證據。有少數字到現在還沒有認出來。

五、確定字義。有時考釋出了文字，仍舊不能理解文義，因為寫的是A，實際上是借A作為與A同音的B用的，這就是所謂假借字(phonetic loan word)。這種情形在流傳的先秦古書裏是經常可以遇到的，不過竹簡和帛書裏假借字出現的頻率更高。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我們在整理銀雀山竹簡時，曾把兩小段碎簡拼接起來，簡文只有七個字：“勝夜戰不勝夜戰”。如果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夜”字，這七個字的意思就無法講通。實際上“夜”是“亦”的假借字，（“夜”本來是由“夕”和“亦”兩個偏旁組成的形聲字，“亦”是它的聲旁。）“勝亦戰，不勝亦戰”是說打得贏要打，打不贏也要打。

以上介紹的是竹簡的整理工作。帛書一般沒有繫連的問題，拼合的情況也和竹簡不同。由於帛書碎片上的文字大都不止一行，因此拼合的線索比竹簡多。不過，整理殘碎得特別厲害的帛書，困難決不在整理殘碎的竹簡之下。至於考釋文字、確定字義等方面，帛書和竹簡是一樣的。

### 價值和意義

如上所述，七十年代在湖南、山東、湖北、安徽等地古墓葬裏發現的竹簡和帛書，大部分是古書的鈔本。這些兩千多年前的手鈔本古書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知道，近代發現的古文獻裏，商周時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都不是書；已發現的戰國楚簡絕大多數是遺策和占卜記錄；西北地區發現的漢簡多數是文書(official documents)、簿籍(registers,

account books, etc.)，古書鈔本只發現過一些零星殘簡。只有 1959 年在甘肅武威縣漢墓裏發現的《儀禮》簡冊，是成篇的古書鈔本，但是抄寫時間約在西漢末至王莽時，比馬王堆等墓的古書鈔本晚了一二百年。至於莫高窟寫本中的古書鈔本，時代就更晚了，大部分晚於馬王堆等墓的古書鈔本八九百年以上。由此可見，在全部近代以來發現的古文獻裏，七十年代發現的秦漢簡冊和帛書，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歷史上看，也只有西漢時代在孔子故宅牆壁裏發現古文經書，西晉時代在汲冢戰國魏墓裏發現《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古書這兩件事，可以與七十年代的發現相比。

下面我們打算扼要介紹一下這批簡冊和帛書在古文獻學、語言學和古代歷史、思想史、科學技術史等方面的重要意義。由於研究工作開始不久，目前還不是對這批資料的學術價值進行全面評價的時候。以下的介紹肯定是不全面的，而且有的部分很可能是不完全中肯的。

### 1. 古文獻學方面

不論是在竹簡或是帛書裏，都保存了不少久已失傳的佚書。其中有目前能看到的中國最古的法律——《秦律》，最古的字書——《倉頡篇》（西北地區曾發現一些零碎的《倉頡篇》殘簡，在數量上無法與雙古堆相比），最古的日曆譜——《元光元年曆譜》，最古的醫書、相畜書、日書、占書和房中術著作；還有亡佚多年的先秦重要著作《齊孫子》、《孫子》佚篇等等。此外，馬王堆還出了中國最早的地圖。這些資料的發現，在古文獻學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馬王堆《周易》不是現存王弼本所從出之本，雙古堆《詩經》也不是現存的《毛詩》，所以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看作佚書。它們對古代經學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傳世的先秦古籍《晏子》、《尉繚子》、《六韜》，曾被人懷疑為秦漢以後的作品。特別是二十、三十年代“疑古”學風興起以後，比較審慎的學者都不敢把這些書當作戰國時代的史料來使用。銀雀山竹簡裏有《晏子》、《尉繚子》和《六韜》的不少篇章，文字與今本大體相同。我們知道，從一部書的開始出現到廣泛傳抄，通常總要經過一段不太短的時間。西漢前期墓裏既然發現了這些書的鈔本，可以想見這些書在戰國時代應該已經出現。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做古書辨偽工作必須十分審慎，不能因為某些古書的思想與我們自己頭腦中想像的古代思想不合，就貿貿然斷定這些古書是後人的偽作。

《齊孫子》的出土也澄清了古文獻學上有爭論的一個問題。相傳《孫子》十三篇的作者是春秋時代的孫武，但是書中有不少內容反映了戰國時代的情況。由於戰國時代孫臏學派的著作《齊孫子》長期失傳，有人懷疑《孫子》十三篇原是《齊孫子》的一部分。銀雀山漢墓中吳、齊兩種《孫子》同時出土，而且顯然是兩種書，這就徹底推翻了上述那種臆說。

把有傳本的古書跟竹簡本或帛書本相對照，可以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歷來受到重視的書，如《老子》、《孫子》一類著作，古本和今本比較接近，出入不是很大。反之，不太受重視的書如《六韜》、《尉繚子》等，今本和古本往往有較大的差別，文字

屢有成句成段地脫落或刪節的情況。此外，比起宋以後的刻本來，唐代類書引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寫本，跟竹簡本或帛書本要接近得多。這說明印刷術的興起一方面減少了古書失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古書文字訛誤衍脫的可能性。刊刻的古書由於所據底本不善，或是刊刻者出於牟利的目的草率從事，往往錯誤很多，而刻本的出現又可能導致各種鈔本失傳，以致好的本子反而被壞的本子淘汰。

竹簡本和帛書本時代早，一般說來比較接近原本，因此可以用來校勘古書，糾正今本的錯誤。例如《孫子·計篇》有一句話，今本作“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簡本作“地者，高下、廣狹、遠近、險易、死生也”，比今本多“高下”二字。《孫子》是兵法書，對於作戰來說，地形高低非常重要，今本在傳抄過程中脫落了這兩個字，是嚴重的錯誤。在已發表的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竹書的注釋裏，可以找到很多這方面的實例。

## 2. 語言學和文字學方面

七十年代發現的竹簡和帛書的總字數估計在二十萬字以上。這為我們研究古代語言和文字提供了極其重要而又豐富的資料。佚書的價值自不待言，就是那些現在有傳本的古書鈔本，由於與原本比較接近，作為語言資料，其價值也遠遠超過今本。舉例來說，馬王堆帛書本《老子》以及銀雀山簡本《孫子》和《晏子》裏的“弗”字，今本往往改作“不”。如果要研究否定詞“不”和“弗”的區別，那自然不能根據今本而應該根據簡本。上文已經提到，竹書和帛書裏保存了大量的同音假借字資料，這是研究古音的重要依據。

自古相傳秦代開始使用隸書。但是過去大家沒有看到過真正的秦隸，就是對西漢前期的隸書也缺乏確切的知識。各墓出土的竹簡和帛書，包括秦墓出土的在內，絕大多數是用隸書或介於篆隸之間的一種過渡字體書寫的。它們填補了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缺環，使大家認識了秦隸的面貌，並了解到隸書實際上在戰國時代的秦國就已初步形成。以前對秦隸的一些錯誤看法得到了糾正。這是中國文字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秦至西漢前期的隸書，是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之間的中間環節，因此無論對於研究古文字還是對於研究近代文字，都是十分重要的參考資料。古書裏有些長期成為問題的字，也由於這批資料的出土而得到了正確的解釋，例如《黃帝內經》裏常見“炅”字，用法與“熱”字十分相似，同樣用法的“炅”字也見於西北地區出土的漢簡。但是字書裏的“炅”字，不但讀音跟“熱”字完全不同，並且也沒有“熱”的意思。馬王堆《老子》甲本有“炅”字，今本和馬王堆《老子》乙本作“熱”的字，甲本作“炅”。由此可知漢代人是把“炅”字當作“熱”的異體字用的（“炅”由“日”、“火”二字合成，日和火都能發熱，“日”字的讀音也與“熱”很相近）。《內經》的“炅”字顯然是從漢代鈔本遺留下來的“熱”字異體，一般人用字書裏“炅”字的音來讀它，是錯誤的。

## 3. 古代社會和歷史的研究方面

銀雀山所出佚書中有《田法》篇，大約作於戰國。篇中講到政府授田給農民的制度、農民的各種負擔以及農民不能完成政府規定的生產任務時所應受的處罰。在現存的戰國史料裏，從來沒有看到過像《田法》那樣具體地談到這些問題的資料。這篇佚書由於竹簡殘損無法恢復原貌，但是殘存部分對於研究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和有關文書，是研究戰國時代秦國以及秦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極為重要的史料。秦代統治時間短，流傳下來的社會經濟史料非常貧乏，因此這批史料的重要性就顯得更為突出了。

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記賦稅、徭役等事項的鄉文書，是現在能看到的這類文書中時代最古的一批。這批文書對於研究西漢前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是在講迷信的日書、占書裏，也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史料。例如睡虎地《日書》裏講到甚麼日子可以買奴隸，甚麼日子不可以賣奴隸，甚麼日子生的孩子不吉利，一定會當奴隸，等等。這對於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情況就非常有用。

馬王堆出土的類似《戰國策》的一種古書，內容大部分不見於《史記》和《戰國策》，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新史料。這部分佚書裏包含了不少關於蘇秦的第一手史料。蘇秦是戰國後期一個以善於游說著稱的政治活動家。由於名聲大，很早就成爲一個傳奇式人物，很多別人的事情以至虛構的故事都被掛到他的名下。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已經弄不清他的歷史，把他的卒年推前了三十年左右，在戰國史上造成了一些混亂，現代學者間早已有人對此產生懷疑。這批新資料的出土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睡虎地出土的大事年表，對《史記》的某些記載也起了補充或糾正的作用。

#### 4. 古代思想史方面

各墓出土的古書，絕大部分都可以用作研究古代思想的資料。其中，在古代思想史上有特別重要的價值的，是馬王堆出土的“黃老學派”的佚書——《經法》等四篇佚書和《伊尹·九主》（即附於《老子》甲、乙本的佚書的主要部分）。

在戰國中後期出現了一個揉合道、法、陰陽等家思想的重要學派，近年來學者多稱之爲“黃老學派”（“老”指老子，“黃”指黃帝，這一派的著作往往托名於黃帝）。黃老學派的著作多已亡佚，流傳下來的著作，有的沒有受到重視，有的雖然受到一定重視，但很少有人從研究黃老學派思想的角度去加以注意。因此學術界長期以來對這一學派沒有明確的認識。馬王堆佚書的出土，大大推動了對黃老學派的研究工作，現在學術界對這一學派的認識，比七十年代之前已經深刻多了。

各座墓葬所出的古書裏都有反映迷信思想的書。除了日書、占書以外，講陰陽五行、時令的書通常也包含這方面的內容。這充分反映了迷信思想在當時人們頭腦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 5. 古代科學技術史方面

馬王堆出土的帛圖中，有一張長沙國南部地區的地圖，其主要部分的比例尺約為十八萬分之一，圖中對山脈、水系、居民點、交通線等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表示，而且精確度相當高。水道大部分接近於現代地圖，縣一級居民點的位置也相當準確。在公元前二世紀能畫出這樣的地圖，實在令人佩服。如果沒有水平相當高的地理學和數學知識以及測量、繪圖技術，這樣的地圖顯然是畫不出來的。這是中國已發現的最古地圖，在世界上同類水平的地圖裏大概也是時代最早的一張。

古代的天文學與占星術是分不開的。馬王堆出土的天象方面的占書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天文學資料。一種關於五星的占書附有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這七十年間木、土、金三星的逐年位置表，並附有關於這三星運行速度的說明。通過表和說明，可以看到當時對行星進行觀測的水平已經相當高。當時測定的金星會合周期為584.4日，比今測值只大0.48日，這是很驚人的成就。另一種關於天文、氣象的占書（原本大約出自戰國時代的楚國），有二十九幅附有說明的彗星圖，彗星名稱共有十八種，各種彗星的圖形基本附合實際，這反映當時對彗星已有很精細的觀察。

馬王堆漢墓出了一批重要醫書，據研究其成書時代多數早於中醫最重要的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其中有現在能看到的中國最古的醫學理論著作、診斷學著作和醫方。此外，墓中還出了一張畫有各種“導引”動作的圖解的帛圖（導引是呼吸運動和軀體運動相結合的一種醫療體育方法）。這批寶貴的醫書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中國古代醫學的認識，對於探索一些重要中醫理論的形成過程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此外，從睡虎地秦簡中的某些治獄文書，可以看出法醫學在當時已經有了比較顯著的萌芽。

馬王堆出土的“相馬”書、銀雀山出土的“相狗”書，反映出當時人對家畜形體以及形體與性能之間的聯繫，有很精細的觀察。不過，有一些說法恐怕並不附合實際情況。

\* \* \*

以上對七十年代發現的秦和西漢前期的簡冊和帛書作了一個極為膚淺的介紹。隨着有關研究工作的進展，這個介紹一定會有越來越多需要加以補充和糾正的地方。

## 參 考 書 目

### 1. 發掘報告和綜合介紹

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下集，1973，文物出版社。

同上：《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7期。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館寫作小組：《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1975年1期。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9期。

李學勤：《記在美國舉行的馬王堆帛書工作會議》，《文物》1979年11期。

山東省博物館等：《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1974年2期。

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文物》1974年2期。

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6期。

同上：《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座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9期。

季助：《雲夢睡虎地秦簡概述》，《文物》1976年5期。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8月。

湖北省博物館等：《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9月。

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6期。

紀南城鳳凰山168號漢墓發掘整理組：《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9期。

鳳凰山167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167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10期。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9期。

## 2. 出土資料的發表（目錄已見第一類者從略。已出單行本者，不收刊物上發表的釋文）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線裝，有圖版，包括《老子》甲、乙本及卷前後佚書，1974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馬王堆漢墓帛書〔叁〕》（線裝，有圖版，包括《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1979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古地圖》（袋裝，有圖版），1977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導引圖》（袋裝，有圖版），文物出版社。

同上：《老子》，1976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經法》，1976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戰國縱橫家書》，1976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五十二病方》，1979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五星占”附表釋文》，《文物》1974年11期。

同上：《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年8期。

顧鐵符：《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內容簡述》，《文物》1978年2期。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線裝，有圖版，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1975年，文物出版社。

陳久金、陳美東：《臨沂出土漢初古曆初探》（有元光元年曆譜摹本），《文物》1974年3期。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孫臏兵法》，1975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孫子兵法》，1976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文物》1976年12期。

同上：《銀雀山簡本“尉繚子”釋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2期。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線裝，有圖版）1977年，文物出版社。

同上：《睡虎地秦墓竹簡》，1978年，文物出版社。

陳振裕：《雲夢西漢墓出土木方初釋》，《文物》1973年9期。

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文物》1974年6期。

弘一：《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簡牘初探》，《文物》1974年6期。

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1974年7月。

金立：《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文物》1976年6期。

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赴紀南城開門辦學小分隊：《鳳凰山167號漢墓遺策考釋》，《文物》1976年10期。